



辽夏金王朝的礼制建构与“中国”认同*

王美华

摘要:受建国历程、疆域扩展及国内政治格局等因素影响,辽夏金王朝的礼制建构各具特色。辽朝礼制发展较为缓慢,呈现出汉仪与族俗并立的局面;西夏在建国之前已开始仿行中国帝制之礼,称帝建国后却长期存在汉礼与蕃仪之争;金朝礼制发展迅速,礼制体系建构相对而言是最为完善的。辽夏金礼制建构的实质是其仿行“中国帝制”建立自己的国家统治模式,是基于对中原王朝制度文明的倾慕而形成的一种归属意识,核心内涵是“中国”认同观念的演进,遵行中国之礼制则为“中国”是其共同的主张和追求。从礼制建构演进的视角可见,在辽夏金与两宋政权并立对峙的时代,“中国”认同观念是超越族群界限、政权疆域、王朝更替等表象的内在脉络,是这一时期中华民族共同体演进的时代特性。

关键词:辽夏金王朝;礼制建构;政治体制;“中国”认同

中图分类号:K2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669(2026)03-0052-07

10—13世纪的中华大地上,辽宋夏金等政权并立,在政权间碰撞、攻伐不断的局势中,民族间的交流融合亦不断深入。对这一时期的民族交融发展的历史进程,学界已有明显关注,讨论持续推进,成果颇丰^①。但对于辽夏金王朝的礼制体系建构及其特点等,仍有进一步探讨之处。因建国历程、疆域范围、政治格局等明显不同,辽夏金王朝的礼制建构亦呈现出明显的差异和特色,然遵行中国之礼制而为“中国”,却成为其共同的主张和追求。因此对辽夏金王朝礼制建构的探讨,有助于更深入地揭示这一时期“中国”认同的趋势及中华民族共同体演进的时代特性。

一、颇取汉家礼仪与辽朝的礼制建构

辽朝是由契丹族建立的政权,契丹族兴起

于西拉木伦河和老哈河流域,建国之前虽已接触中原文化,并受到中原王朝的影响,但其统治处于多按族俗旧制行事的状态。从耶律阿保机正式建国开始,随着效仿中原王朝的皇帝体制和各项典章制度的发展^②,辽朝亦吸收和行用中原王朝礼仪典制,逐步建构起自己的礼制体系,以适应国家统治的需求。

辽太祖、辽太宗时期,是辽朝疆域扩展及王朝体制创建时期,也是礼制体系初建时期。辽太祖耶律阿保机称帝建国,设国号、置年号、上尊号,以及改元、大赦、册皇后、立皇太子的系列行为,明显是对中原王朝帝制传统的承继和效仿。其后修建孔子庙,耶律阿保机不仅令皇太子春秋释奠^③,其亦亲至庙堂行礼,以宣明对孔子的尊崇和对中原王朝释奠礼制的遵循。因当时辽朝“仪法疏阔”,他命总知汉儿司事兼主诸国礼仪的汉族士人韩知古专门负责制定朝廷礼仪。韩知古

收稿日期:2026-03-08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中国历史研究院重大历史问题研究专项“中国礼制文化与国家治理研究”(22VLS004)、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家礼修撰与宋代社会变迁研究”(21BZS054)。

作者简介:王美华,女,辽宁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辽宁沈阳 110136),主要从事唐宋史、中古礼制史及东北民族史研究。

遂“援据故典”参酌“国俗”并杂就参合“汉仪”，修成礼仪“使国人易知而行”^{[1]1233}。

辽太宗耶律德光时期，朝堂仪轨、宗庙陵寝及丧服仪制等已有雏形。如其继位之初，即为耶律阿保机定谥号和庙号，并建置陵寝。会同九年（946年），辽太宗耶律德光率军南伐，灭后晋政权。据《辽史》记载，大同元年（947年）春正月丁亥朔，辽太宗“备法驾入汴”^{[1]59}，御崇元殿受百官朝贺。入汴之后的辽太宗亲身体验了中原王朝的朝廷礼仪。又据欧阳修《新五代史》载：开运四年（947年）正月甲午，“德光胡服视朝于广政殿”^{[2]897}；乙未，又“被中国冠服，百官常参，起居如晋仪”^{[2]897}；二月丁巳朔时，“金吾六军、殿中省仗、太常乐舞陈于廷，德光冠通天冠，服绛纱袍，执大珪以视朝”^{[2]897}，大赦，改晋国为大辽国；及至三月丙戌朔，耶律德光服靴、袍，“御崇元殿，百官入阁”^{[2]898}，即遵照后晋之仪制举行入阁礼。耶律德光大悦，端坐于正殿，亲身感受“汉家”朝仪的隆重和威严，不禁“顾其左右”赞叹曰：“汉家仪物，其盛如此。我得于此殿坐，岂非真天子邪！”^{[2]898}辽太宗入汴亲身感受后晋朝堂仪制盛势之赞叹，表露的恰是其自身王朝体制建设发展中的礼制需求。辽太宗入汴时间虽然短暂，但是对辽朝礼制的影响却是不可低估的。如《辽史》载，辽太宗入汴，“取晋图书、礼器而北，然后制度渐以修举”^{[1]1445}。后晋之图籍、历象、明堂刻漏、太常乐谱、宫悬、鹵簿、法物、铠仗等典籍、仪物、礼乐之器被悉数送往上京^④，奠定了辽朝礼制发展的基础。

随着辽朝政治体制的不断发展，皇权尊崇及集权统治模式渐趋明显，与之相应，辽朝统治者亦更注重效仿中原王朝典章，修制施行朝廷的诸项礼仪，其礼制体系也随之发展起来。如辽穆宗时曾诏令朝会依太宗朝故事，“用汉礼”^{[1]69}。辽圣宗时，政局逐渐稳定，国家典章制度日趋完备，其明确强调以中国典章礼义维持治国之政，实现“上下相安”的局面^⑤。辽兴宗在位时，秉承中原传统政论之说“古之治天下者，明礼义，正法度”^{[1]1450}，认为“我朝之兴，世有明德，虽中外向化，然礼书未作，无以示后世”^{[1]1450}，遂正式提出修制国家礼典，并于重熙十五年（1046年）诏命朝臣“酌古准今，制为礼典，事或有疑，与北、南

院同议”^{[1]1450}。经过博考经籍，终于制成“自天子达于庶人，情文制度可行于世，不缪于古者”^{[1]1450}的官修礼典，由此厘清和规范了辽朝的礼制体系，明晰和确定了国家的礼义法度，此礼典可谓辽朝礼制发展的重要标志。

随着辽朝国家体制的发展演进，朝廷仪制也逐步由多用旧俗的简朴状态，演进为明显遵行汉仪的繁杂状态。审视辽朝以族俗传统为基础，吸纳、仿效汉仪所构建的礼制体系，大体可以较为清楚地看出族俗与汉仪的区分。契丹民族传统的神灵崇拜和信仰、部落的军事征伐活动、社会生活中的婚姻习俗等，有的经过规范化、仪式化转变为礼制内容，如祭山仪、瑟瑟仪、柴册仪、拜日仪、蕪节仪、射鬼箭、以青牛白马为牺牲^⑥等。与此同时，有些传统习俗则逐渐被摒弃，未能转变为礼制的固定内容，如契丹传统的丧葬习俗。契丹族的传统习俗主要保留在祭祀活动和军事征伐活动之中，若按照“五礼”来划分的话，其在吉礼和军礼中是较为突出的。与此相对应的是，辽朝嘉礼、宾礼、凶礼仪制主要受到中原王朝礼制的直接影响。尤其是嘉礼中的朝堂仪制，从常朝起居到正旦朝贺，从圣节大礼到奉上尊号，从宰相中谢到进士赐服，从临轩册命到恭问圣体，从臣僚接见到臣僚拜表，其仪制条目繁杂，内容翔实细致，充分彰显了辽朝国家体制的核心，即皇帝制度和集权体制下尊君卑臣的朝堂秩序。至于宾礼部分亦凸显对汉仪的效仿，如《辽史·礼志》中记载的接待外使诸仪^⑦。辽朝接待外使的诸仪制，不仅与国家政治体制的发展有关，更与当时对外格局的演变有着直接联系，其仪式程序显然主要是遵从汉仪而来。

金人陈大任在总结辽朝“皆其国俗”的仪制基础上撰成《辽礼仪志》，又整理辽朝“汉仪为多”的礼文修成《辽朝杂礼》^⑧。两种礼书的撰修，亦反映出辽朝礼制体系独特的族俗与汉仪并立的格局，而这种并立格局恰对应了辽朝政治体制中南北面官制的特点。辽朝礼制的建构发展，清晰地映现出中原王朝制度文明的影响力。值得注意的是，同样是在中原王朝制度文明影响之下，党项族建立的西夏王朝，其礼制建构发展的历程却呈现出另一种特征。

二、蕃礼、汉礼之争与西夏礼制的发展

西夏是党项人建立的政权,其亦注重建构发展礼制,将其作为王朝制度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党项本是西羌的一支,或称“党项羌”。唐时党项诸部内迁,逐渐集中于灵、庆、夏、银、绥等州,内迁的党项人深受中原文化的影响。唐僖宗时,党项平夏部首领拓跋思恭率兵镇压黄巢军,唐在夏州设“定难军节度”,封其为夏国公,赐姓李^①。此时党项人已经渐趋熟悉唐朝的政治体制及礼乐卤簿等,至唐末五代时期党项发展成为占有夏、绥等州的地方割据势力。北宋建国之后,党项于北宋与辽朝的抗衡关系中获利,从两国获得封爵、赏赐,谋求自身势力的发展。在此过程中其逐步效仿唐宋典章制度,建构自己的政权体制。

李继迁于990年接受辽朝册封夏国王称号时,即曾“潜设中官”,“渐行中国之风”^{[3]1099-1100},全异羌夷之体。及至李继迁之子李德明时期,虽仍“臣宋与契丹”^{[4]112},却已是“僭拟日甚”^{[4]112},着手筹备建国称帝,曾使数万人修建宫室,出行之际乃“大辇方舆、卤簿仪卫,一如中国帝制”^{[4]112}。据载,李德明“号令部署、宫室旌旗,一拟王者”^{[5]14},服饰赭袍,鸣鞘鼓吹,“殊无畏避”^{[5]14},此时西夏地区已初步形成了与“中国帝制”相关的仪制内容。正是在这种效仿中原王朝“帝制”统治体制的趋向下,1016年李德明直接追谥其父李继迁为“太祖应运法天神智仁圣至道广德光孝皇帝”^{[6]13991},庙号武宗。按照中原王朝礼制传统,追尊父祖为“皇帝”并加尊庙号,乃是称帝建国之后建置宗庙以尊祀祖宗的定规,可谓王朝开国之际的惯制。李德明此举明确宣示了其称帝建国的意图。

值得注意的是,李德明时期全面仿效“中国帝制”、遵行中原王朝礼制的趋向,至李元昊时期呈现出明显转变。李元昊继王位后,废除汉姓,以北魏王室后裔自居,进而将拓跋氏族姓改为“嵬名氏”,并颁布秃发令,要求国人一律秃发,以恢复部族旧俗,后又仿吐蕃风俗,颁定官民服饰。元昊的各种举措旨在突出自身的“蕃性”特征。针对礼乐诸仪旧用唐宋之制的情况,

元昊宣称:“王者制礼作乐,道在宜民。蕃俗以忠实为先,战斗为务,若唐宋之缠节繁音,吾不取焉。”^{[4]146}乃于吉凶、嘉宾、宗祀、燕享诸礼,“裁礼之九拜为三拜,革乐之五音为一音”^{[4]146},并明令于国中,“有不遵者,族”^{[4]146}。姓名、服饰、发型及礼拜、乐音等作为外在表征,凸显了元昊时期西夏礼制“去汉制”而“显蕃性”的转变,亦被认为是用蕃俗抗衡汉礼汉制。但需注意的是,从文献记载来看,所谓“更定礼乐”^{[4]146}及号称遵用蕃俗的主要表现,除了姓名、发型、官民服饰等之外,朝廷礼制层面则只是针对礼拜次数及乐音的删减。换言之,只是不取唐宋礼乐中的“缠节繁音”而已,其礼制的基本原则及精神并未改变^②,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元昊所秉承的政权体制依旧是行“中国帝制”也。

1038年十月,元昊正式称皇帝,国号大夏,改元天授礼法延祚,于兴庆府南郊筑坛,追谥父祖为皇帝,建宗庙,置陵寝。元昊于次年正月上表宋朝,要求宋朝承认其称帝建国,表文之中尤为强调“礼乐既张,器用既备”^{[6]13995-13996}。从其称帝建国的系列活动可见,元昊遵循了中原王朝传统的称帝建国的礼制程序。中原王朝礼制对西夏称帝建国的重要意义,也可以从年号“天授礼法延祚”之寓意中看出。元昊的建国誓表亦表明其所建立的“大夏”王朝,仍是以华夏文明为基调的王朝国家^③。

元昊之后,西夏国内政治局势不稳,效仿中原王朝体制的集中皇权与坚持固有传统的守旧贵族势力之间矛盾冲突不断,局势动荡之际,礼制建构层面呈现出遵行蕃礼与循用汉仪之争^④。毅宗谅祚在位时曾上表宋朝,表示“本国窃慕汉衣冠,今国人皆不用蕃礼。明年欲以汉仪迎待朝廷使人”^{[3]4730},意欲废止蕃礼,施行汉仪。惠宗秉常幼年继位,母后摄政,其时行蕃礼而废汉礼。秉常亲政后,大安六年(1079年)下令国内复行汉礼。直至崇宗乾顺时,国内局势稳定,皇权巩固,致力于修整内政,积极推行汉化,倡导汉礼,汉礼与蕃礼之争乃息。仁宗仁孝继位之后,更效仿唐宋修建太学(庙学)之制^⑤,并亲行释奠,尊崇孔子为“文宣帝”^{[4]416},又令地方州郡悉建孔庙以祭祀孔子,其殿庭宏敞并如帝制。此外,还命乐官仿照宋朝乐书重修夏国之乐

律。这一时期西夏的礼制体系有了全面发展。

西夏王朝效仿中原王朝礼制,建构了一套较为完整的礼制体系。作为西夏王朝制度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西夏礼制体系亦具有自身的独特性。与皇权尊崇、君臣尊卑、朝堂秩序等紧密关联的部分,西夏礼制循用中原王朝礼制的倾向最为明显,如吉礼之中的郊坛祭天、置宗庙奉祀祖宗、立庙学释奠孔子等^⑤;再如嘉礼范畴中的朝会之礼,包括常规朝仪、正朔朝贺等皆效仿唐宋之制^⑥,正所谓“正朔朝贺杂用唐宋典式”^{[4]152}。上述仪制内容直接体现了皇帝体制及集权统治模式是西夏称帝建国后礼制建构中最为注重的部分。西夏在军事活动、婚丧嫁娶等方面则呈现出较多的族俗特色,如军礼中的占卜、盟誓、杀鬼招魂等诸仪,明显遵循族俗传统而来^⑦。由此言之,亦更能理解虽然在一定时期内存在的汉礼与蕃仪之争,但并未改变西夏王朝礼制的基本精神,亦更未影响到其对中国礼法的延续以及对“大夏”王朝形象的塑造。

三、行中原礼制与金朝礼制体系的演进

金是女真族建立的王朝,作为东北地区的古老民族,女真族称虽出现在五代时期,但其历史久远,可上溯至商周时期的肃慎。1115年,女真完颜部首领阿骨打于今黑龙江阿城建国,国号为金。金朝建立之后,以强大的军事力量南下征战,于金太宗天会三年(1125年)灭辽,天会五年(1127年)亡北宋,疆域扩展至黄河流域,成为与南宋强势对峙的北方王朝。

金朝建立之初保持着浓厚的族俗传统,其政治统治亦依女真旧制。随着女真政权的稳定发展,完颜阿骨打的权威不断提升,君臣之别日趋显现,对礼制的遵行亦备受重视,所谓“天辅后,始正君臣之礼焉”^{[7]1615}。天辅五年(1121年)十二月,金太祖完颜阿骨打特颁诏云:若克辽之中京,“所得礼乐仪仗图书文籍,并先次津发赴阙”^{[7]36}。金太宗时期疆域迅速扩展,为应对新的统治形势,金朝国家的主体制度逐步向中原王朝制度转变,由此亦呈现出效仿中原王朝礼制渐次建构国家礼制体系的倾向。天会三年

(1125年),金太宗建乾元殿,君臣之间居室之别始现,同时“始议礼制度,正官名,定服色”^{[7]1742}。及攻取北宋都城汴京时,金人“既悉收其图籍,载其车辂、法物、仪仗而北”^{[7]691}。金太宗时期奠定了灭辽亡宋、入主中原的政治格局,又吸收了辽与北宋礼乐典制的基础,随着辽朝仕宦、中原文人的入朝任职,全面“改定制度”^{[7]65},金朝的礼制体系迅速发展。

金熙宗和海陵王时,金朝国家体制向中原王朝体制的转变已经完成,礼制体系建设进入全面推进阶段。金熙宗仿汉制建宫殿,创建仪卫诸制,又定出行规仪,“始乘玉辂,服袞冕,仪从方整肃”^[8],凸显为君之尊荣,强化君臣之别。天眷二年(1139年),诏命详仪制,百官朝参初用朝服,皇帝初御冠服^⑧,君臣、官民之间的服饰界限逐渐严格。此外,又兴建宗庙社稷,确定朝仪诸制。去“夷狄之俗”而“行中原礼制”,正是熙宗时代治国举措的重点^⑨。海陵王完颜亮时,更大程度上遵行中原王朝礼制,南北郊祀、太庙、陵寝、社稷等诸项重要礼制明确完备起来,尊君卑臣的礼仪等级制度森严,朝会诸仪的规制细致完备。后世言及金熙宗与完颜亮时曾云“废其祖宗时衣冠仪度,循汉人之俗,遂服汉人衣冠”^[9],正反映了这一时期金朝遵行中原王朝礼制建构本朝礼制的情形。

金世宗、金章宗在位时,金朝社会发展到了鼎盛阶段,秩序稳定,经济繁荣,礼制体系亦进入全面制礼作乐的阶段。金世宗设礼仪“详定所”,命朝臣参校唐宋王朝的典章仪制和沿革故事,详议修制本朝的礼仪制度;又设“详校所”,以审定修撰本朝乐律之制。二者皆以宰相统属,凡涉及礼乐仪制之事,皆需上奏皇帝,获许后始行编次。至金章宗明昌初年,汇总编集成书大约四百余卷,是为金朝第一部重要礼书《金纂修杂录》^⑩。书中集中讨论议定者,不仅涉及丧葬、郊庙、朝仪诸制,还包括宴飨、服饰、卤簿等各种内容。此时朝廷礼制议论的范围已经从皇帝郊庙、国丧诸制,朝堂之上的君臣礼仪、奏对仪节及宫殿禁制等,扩展到社会层面中的礼仪规范。

金朝中期,国家的礼制体系建构日趋全面,不仅将礼文仪制编纂成集、汇总成册,以便于遵

行,更有意识地撰修国家礼典,强化礼制规范,其时曾撰制《大金仪礼》《大金集礼》《礼例纂》等礼仪典籍。相对于辽朝及西夏而言,金朝礼制体系建构无疑更趋完善和周备,对中原王朝礼制的遵行也更为全面。与唐宋王朝的“五礼”相同,吉礼和嘉礼部分是金朝礼制体系的主体,郊天祭祖、诸项朝仪等因凸显政权统治的合法性和神圣性,彰显皇帝至尊权威,而备受重视,礼文仪制详备,遵行严格。金朝礼制体系中依然包含女真民族传统的礼制内容,例如拜天、朝日、射柳及烧饭等源自族俗旧习的仪制明确存在,但其显然已被融入王朝礼制体系之中,演化为保留族俗因素的仪式化的朝廷典礼。在金朝礼制体系中,源于族俗而来的内容所占的比重是明显低于辽朝和西夏的,之所以会呈现这样的局面,根本原因就在于金朝更趋向中原王朝化的国家体制。

四、殊途而同归:礼制建构视域中 辽夏金王朝的“中国”认同

作为10—13世纪存在的重要民族政权,辽夏金王朝的礼制建构,形成各具特色的礼制体系和礼教文化特点。辽朝礼制呈现出汉仪与族俗并立的格局,西夏存在汉仪与蕃礼之争,金朝则形成融入族俗传统的完备的王朝礼制体系。三者的发展进程也有所不同,相较而言,辽朝礼制发展较为缓慢,体系建构也有明显局限;西夏的礼制体系建设虽然在建国之前已经有所展开,但是在称帝建国之后的历程中始终受到蕃俗的影响;金朝的礼制建构发展迅速,是三者之中礼制体系建构最完备者。辽夏金王朝礼制建构之所以会呈现明显不同,大体而言,主要源于建国历程、疆域扩展及国内政治格局等因素的影响。

辽建国之后,疆域扩展由东至西,横贯草原,南至燕云地区。整体而言,其疆域之内汉地范围较为有限,主体还是以草原为中心。辽虽曾有南下中原之意,但长久定位仍是与宋朝相对的“北朝”。辽朝国家体制中的南北面官制,表明其国家统治中民族传统因素仍是重要存在,如四时捺钵等。而与此种政治体制相对应

的礼制体系必然会受到影响,这也正是辽朝礼制体系中存在诸多族俗的原因。西夏在筹备建国称帝之时,虽已明确“一如中国帝制”行事,然其后随着疆域范围扩大,逐步囊括河陇地区,占据吐蕃等部之地后,内部民族复杂,各方势力纠葛。为了巩固统治,开始宣示以党项羌为首的“蕃族利益”,以整合内部各族力量^⑨,遂有删减汉仪而凸显蕃俗之举,促使西夏建国后的礼制建构进程中呈现出汉礼与蕃礼之争。金朝的礼制建构亦与其王朝发展进程密切关联。世居东北一隅的女真人建立的金朝,发展迅猛,快速成为一个占据中原地区的强盛王朝。随着疆域范围的扩大,其王朝定位也开始发生变化,渐趋以经略中原以立正统、承续中原王朝之序为目标^⑩。事实上,当金人明确了承续中原王朝以立正统时,其对遵行中原王朝礼制、完善本朝礼制体系建构的需求就迫切起来。而此也可从金朝中期全面参校唐宋王朝礼制沿革故事,详议本朝礼制及撰修礼典礼书的举措中反映出来。

辽夏金王朝礼制建构的实质在于其政治体制对中原王朝的效仿,如皇帝制度、官制体系、中央集权及地方行政区划等。契丹、党项、女真民族在积极仿效中原王朝政治体制,建构具有自身特色的统治模式的同时,亦将中原王朝制度体系中的礼制体系“移植”过来。从制度层面而言,礼制是国家制度体系的重要内容,其独特之处在于能够超越制度体系层面而演化成为一种被广泛认可和接受的文明模式,发展成为民族政权塑造王朝形象、形成“中国”认同的重要依据和标识。

自先秦以来,是否遵行中国之礼成为区分“中国”和“四夷”的明确依据^⑪,这种思想观念亦不可避免地影响着周边民族政权的自我定位。辽夏金王朝礼制体系的建构是其仿行“中国帝制”政治体制的外在呈现,更是基于对中原王朝制度文明的倾慕而形成的一种归属意识,核心内涵则是“中国”认同观念的演进。辽朝“颇取中国典章礼义”^{[3] 6952},强调治天下者必须“明礼正法”,因此制定本朝礼仪,撰制礼典。正因其遵行中国之礼制,所以在与宋朝交往之际,着意强调与华夏同风,反对宋人将其视为蕃夷。辽道宗更是宣称其“文物彬彬,不异中华”^[10],遵行

中国之礼制,这是辽朝敢于自称为“中国”的心理底蕴。西夏则从元昊称帝之初,就在给宋朝的上表中以“礼乐既张”“郊坛备礼”“天授礼法延祚”之表述,明确宣示其是宋朝西方“大夏”之国的定位^②。其后西夏礼制发展演进,或“杂用唐、宋”^{[6]14028}之制,或多与宋同,甚至更有超越唐宋之举,直接“尊孔子以帝号”^{[7]2877},将孔子崇祀等级推向极致,皆意在塑造其“与中国等”^{[3]3641}的形象。金时女真人入主中原,建构完备的礼制体系,亦明确强调进于中国、用中国之礼即为“中国”的自我意识。海陵王完颜亮提出“欲绍中国之正统”^[11],更大范围地完善王朝礼制。从文献记载可见,海陵王以后,金人已经惯于自称“中国”。金朝后期,赵秉文强调夷狄遵用中国之礼则为“中国”之论,金人遵行中国礼制则为“中国”^③。至金朝末期哀宗即位时,元好问撰《拟贺登宝位表》,文中更有明确自称“中国”之语^④。从进于中国、行中国之礼制则为中国而言,金人的“中国”认同观念显然比辽朝和西夏要更鲜明,其已明确建立起承继“中国正统”的强烈自信。

总体而言,辽夏金王朝的礼制建构,因受建国历程、疆域范围及其内部政治格局等因素的影响呈现出不同的特点。然在国家政治体制皆为仿效“中国帝制”王朝体制的基础上,辽夏金王朝的礼制建构无疑具有共同的趋向,遵行中国之礼而为“中国”是其共同的主张和追求。因此,从礼制建构演进的视角,可以更清晰地看出,在辽夏金与两宋政权并立对峙的时代,“中国”认同观念是超越族群界限、政权疆域、王朝更替等表象的内在脉络。它是中原王朝制度文明向周边民族地区的外延扩展,是“中国”影响力空前增强的体现,更是周边地区各民族向内凝聚、归属意识的发展,中华民族的内聚性得以空前呈现^⑤。由此而言,这一时期虽是一个分裂对峙的时代,却也恰是趋向“大一统”的时代。

注释

①关于辽夏金对峙时期民族交融历程的研究,21世纪初以来得到学界的关注,近年来研究论著不断涌现,如佟建荣:《论辽夏金文化中的两种传统》,《固原师专学报》2005年第1期;赵永春、王观:《10—13世纪民族政权

对峙时期的“中国”认同》,《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1期;马升林、彭向前:《试论辽夏金时期少数民族政权的“中国观”》,《宁夏社会科学》2020年第2期;王文光、江也川:《辽夏金的中华文化认同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4期;高福顺:《辽宋夏金时期内聚性不断增强》,《历史评论》2021年第3期;史金波:《宋辽夏金时期的文物与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教学(下半月刊)》2024年第1期;程尼娜:《分立与整体:辽宋夏金时期中国历史整体性的发展轨迹》,《史学集刊》2024年第5期;等等。②在北方民族发展的过程中,中原王朝的制度、文化对北方民族形成深远影响,成为其进一步发展的基调和底色。参见杨军:《中原王朝对契丹政权的影响》,《历史研究》2025年第11期。③④⑦⑧脱脱等:《辽史》,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209页,第60页,第848—856页,第834页。⑤⑨脱脱等:《宋史》,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0863页,第13995—13996页。⑥青牛白马对于契丹人具有“原始宗教信仰形态下的图腾崇拜性质”,以青牛白马祭天地当是契丹族一种古老的传统礼俗。参见刘浦江:《契丹族的历史记忆——以“青牛白马”说为中心》,载氏著《松漠之间——辽金契丹女真史研究》,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99—122页。⑦欧阳修、宋祁:《新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6218页。⑧李华瑞:《重建华夏文明:元昊建国历史意义的新思考》,《中国史研究动态》2024年第3期。⑨杜建录:《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的西夏文化》,《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6期;李华瑞:《重建华夏文明:元昊建国历史意义的新思考》。⑩蕃礼,并非单纯的“蕃俗”,乃是对汉仪进行裁革之后,饰以蕃俗服饰、语言文字等,亦即强调使用蕃语、蕃文、蕃服,保持蕃人习俗较为明显的礼俗。参见史金波:《西夏社会》(下),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810页。⑪西夏太学乃庙学之制,在颂扬仁宗乾祐二十三年(1192年)重修太学事的《新修太学歌》中,即有“座落儒王新殿”之语。参见聂鸿音:《西夏文〈新修太学歌〉考释》,《宁夏社会科学》1990年第3期。⑫西夏王朝曾建立一个覆盖全国、上下贯通的国家祭祀体系,通过稳定的国家祭祀体系将国家的价值规范和意志以祭祀的形式传递,达到强化社会认同和塑造权威的目的。参见孔德翊:《西夏国家祭祀初探》,《宗教学研究》2014年第2期。⑬艾红玲认为西夏朝会之礼源于唐宋,但是仪式有所简化。见艾红玲:《西夏礼仪制度考论》,《宁夏社会科学》2009年第1期。⑭艾红玲:《西夏礼仪制度考论》。⑮⑯脱脱等:《金史》,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74页,第692页。⑰张博泉:《金代礼制初论》,《北方文物》1988年第4期。⑱吴天墀:《西夏史稿》,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30—31页。⑲何玉红、张

宸:《汉地统治方略转变与金朝“中国”认同研究》,《学术月刊》2026年第1期。②赵永春等:《中国古代东北民族的“中国”认同》,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105—106页。③张金吾编纂:《金文最》,中华书局2020年版,第845页。④元好问著、狄宝心校注:《元好问文编年校注》,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46页。⑤高福顺:《辽宋夏金时期内聚性不断增强》。

参考文献

- [1]脱脱,等.辽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
[2]欧阳修.新五代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
[3]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M].北京:中华书局,2004.
[4]吴广成.西夏书事校证[M].龚世俊,等校证.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

- [5]田况.儒林公议[M].张其凡,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17.
[6]脱脱,等.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1985.
[7]脱脱,等.金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5.
[8]宇文懋昭.大金国志校证[M].崔文印,校证.北京:中华书局,1986:475.
[9]钦定皇朝文献通考:四[M]//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35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111.
[10]叶隆礼.契丹国志[M].贾敬颜,林荣贵,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14:106.
[11]中兴御侮录[M]//全宋笔记:第61册.郑州:大象出版社,2019:6.

The Ritual System Construction and “China” Identity of the Liao, Western Xia, and Jin Dynasties

Wang Meihua

Abstract: Shaped by factors such as state-founding processes, territorial expansion, and domestic political configurations, the ritual system construction of the Liao, Western Xia, and Jin dynasties exhibits distinct characteristics. The Liao dynasty witnessed relatively slow development of its ritual system, featuring a coexistence of Han rituals and ethnic customs. The Western Xia had already begun to emulate the rituals of the Chinese imperial system prior to its formal establishment; however, after the emperor assumed the throne and founded the dynasty, a prolonged struggle persisted between Han rituals and ethnic ceremonial traditions. The Jin dynasty’s ritual system developed expeditiously, emerging as the most systematically refined among the three. The essence of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ritual system in the Liao, Xia and Jin dynasties was to establish their own national governance model by emulating the “Chinese imperial system”, which was a sense of belonging formed out of admiration for the institutional civilization of the Central Plains dynasties. The core connotation was the evolution of the concept of “China” identity, and following the ritual system of China was their common assertion and pursui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evolution of ritual system construction, it can be seen that during the era of parallel and confrontational regimes such as the Liao, Song, Xia, and Jin dynasties, the concept of “China” identity was an underlying thread transcending ethnic boundaries, the territorial boundaries of regimes, and the alternation of dynasties. This was the characteristic of the evolu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 during this period.

Keywords: Liao, Western Xia, and Jin dynasties; ritual system construction; political system; “China” identity

[责任编辑/晨 潇]